

焦裕禄的红色家风接力

余玮

剩下多少花多少

1964年2月7日,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。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,决定照顾他3斤棉花,让他换件新棉袄。同志们怕焦裕禄不要,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。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,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。他对救灾办公室的同志说:“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,我们不能要。虽说我的棉袄破点,但还能穿,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。作为领导干部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,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。”

实际上,焦裕禄的许多衣物都该换了。一床被子用了几十年,被里烂了就翻过来用,衣服、鞋袜补了又补。徐俊雅总想给他换件新的衣服,而他却常常对家属说:“现在兰考遭灾,群众生活很苦。跟群众相比,咱穿的就不错了。比我要饭时披麻包片,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!”有一次,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又破了,焦裕禄又让爱人徐俊雅缝补。徐俊雅一看实在是破得不能再补了,就不愿意补。焦裕禄又求岳母给缝补,焦裕禄的岳母也说太破不能补了。于是,焦裕禄就自己动手缝补,还笑着说:“袜底补丁多了,越厚实,站得越稳。衣服补丁多了,穿着结实。”这时,徐俊雅又心疼地把衣服拿回去认真缝起来……

自从1959年发现焦裕禄有肝病以后,徐俊雅就把这因操劳、苦劳和营养不良所致的病放到了自己的心上。她承包了家中一切粗活、细活,买米买面,劈柴买炭,赶集上店,打醋称盐,“连一条小手绢也没让他洗过”。

焦裕禄去世后,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,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兰考县的退休干部王怀彦当年在县政府管理财务工作,他回忆起1965年有一次到徐俊雅家送工资的情形。当时,徐俊雅一家老小住在县委大院附近的3间瓦房里。王怀彦见灶台上放着剩饭,窝头已发黏了,就问徐俊雅为啥还舍不得丢掉。徐俊雅说,在水里泡泡,上笼蒸蒸,还能吃。王怀彦问,这一大家子人,钱够用吗?徐俊雅淡淡地说,工资发下来,买了面、买了煤,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了。王怀彦说,焦书记在世时,一月工资80多块钱,徐俊雅在兰考县统计局工作,每月工资57块钱,家里虽然人口多,但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还够用。但焦书记去世后,徐俊雅要养活一大家子人,就难了。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,生活很拮据。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临终前的遗言:“我死后,你会很难,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、要救济。”

焦家孩子多,吃饭是头等大事,穿衣就顾不得许多了。二女儿焦守云回忆说: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,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,然后再用剪刀、针线把衣服改小,母亲边做活边流泪。有时,“针也拿不住,剪刀也拿不住,手发抖,缝也缝不了。有几次竟泪眼模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”。谈及母亲,焦守云数度哽咽。在她的记忆里,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。

一件衣服,老大穿完老二穿。一个作业本,正、反面都用完,才会换新的。焦守云清楚地记得,有一次母亲为了给一家人改善生活,到街上去买鸡蛋,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,说一下子找不开钱,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下,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,母亲信了鸡蛋贩子的话,就在原地等他回来,哪知,等了好久,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,母亲这时才知道上了当。“回到家来,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,1元钱,在当时就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!”

那个时候,焦家最怕过春节、也最怕清明节。“我妈是个非常内向的人,我爸去世后她好多事情不愿意说,整天流泪,默默地做着一切。我爸去世后,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。那几年,每年的除夕夜,我妈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。但包了饺子以后,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,她就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。我们心里清楚,我妈是在想念父亲!”焦守云回忆说:“每到清明节,我妈手把我们的小手给我爸扫墓的时候,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我爸的墓前,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,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。后来,我妈养成了个习惯,无论她住在哪,她都把我爸的遗像搬到哪里,每日总是看了又看,擦了又擦,就这样苦守着我爸。我们家离我爸的墓地很近,只要她在家,一早一晚她总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。她和父亲有很多的话要说,要倾诉。”

徐俊雅性情温和,不事张扬,从不愿给人添麻烦,包括自己的儿女。后来,6个儿女一个个走出兰考,在外工作,离休后的徐俊雅仍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,仍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、与人聊天的习惯。由于年轻时清贫度日,操劳过度,晚年的她一直在承受着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的折磨。她手脚经常麻木,腿脚浮肿、疼痛,从家中到焦裕禄陵园大门,100多米的距离,需要两次歇息才能走到。

2022年,是焦裕禄诞辰100周年。近些年来,笔者很荣幸有机会重访焦裕禄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和他的家人,寻访焦裕禄事迹的知情人与相关重大事件的发生地,走读焦裕禄精神的点点滴滴,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焦裕禄这个红色传奇与红色符号。



影(图为徐俊雅同孩子们在一起)。

焦守凤感觉自己“低人一等”

焦守凤,1945年出生,小名“小梅”。在焦守凤的印象中,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。“天不亮就走了,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,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、开会,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。”焦守凤说,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,但也非常疼爱,“每次回家见到我们,都会摸着我们几个的头,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,他从来没有打过和骂过我们。”

“我爸的办公室从来不让别人进去,我们也不想进他的办公室,办公室听说啥也没有,还没有外面好玩。他晚上有时在家办公到深夜,公家的墨水不让我们用,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拿。”在焦守凤的记忆中,一家人一起吃饭是难得的幸福时光,父亲会照例问起子女们的学习近况,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、团结同学,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高人一等。焦守凤却感觉自己“低人一等”。原来,母亲(徐俊雅)曾亲手给焦守凤做过一件花色大衣,这件大衣焦守凤一直穿到上初中。那时候,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,同学笑她:“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如我们呢,衣服上还有补丁。”她觉得委屈,就央求父亲给她换件新大衣。父亲说:“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,要说特殊,只能是更加爱学习,爱劳动,而不是爱攀比。学习上向先进看齐,生活条件跟差的比。”

焦守凤初中毕业后,就参加工作了。“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,父亲就打算也让我下乡,他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人。”焦守凤说。

对于让焦守凤下乡的事情,徐俊雅很反对,认为应该把守凤留在身边。“为我的事父母吵了几次,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让我去了副食品加工厂。”焦守凤说,焦裕禄担心厂里对

守凤另眼看待,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。“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,让我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。在厂里,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,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去送。”焦守凤说,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,要求她到厂里和别人同吃同住。“当时我很不理解,就不搭理他,回家也不和他说话。”焦守凤记得,父亲让自己去供销社副食品加工厂干临时工:洗萝卜、切萝卜、做咸菜,啥都干。那时候,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,还要切几百斤辣椒,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。她几次哭着埋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。

接受专访时,焦守凤说:“以前没有走上社会,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。我爸就是想让我多了解社会,了解一下生活的艰难。以前的一切就是父母安排,毕业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作为孩子来说,对这些不理解,一些好单位我自己报上了名,也没有借用他的名义报的名,可是他不上班,说都是机关,不利于了解社会。他这么做,我当时自然不能接受。”

有一年父亲祭日,焦守凤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,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老太太说:“焦书记可真是个好心人,也不知他家的孩子们现今都干啥哩,过得好不好?”那一刻,焦守凤泪流满面,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

擦亮“焦裕禄精神”这块牌匾



早年焦裕禄

大,在平凡中默默传承着父亲的精神。焦守凤也认为,父亲的精神,很多来自奶奶。

焦守凤与奶奶共同生活了9年。她说:“奶奶就像大山一样宽厚无言,再大的困难面前都不曾低头,坚韧地面对生活,奶奶对父亲影响很大,尽管她没有文化,但她一直教育父亲——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丁,就是说人来到世上不能白白走一遭,要有担当才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放光芒。父亲就是这样带着奶奶‘好男儿要有担当’的叮嘱走出大山,南下,到了兰考这片更艰苦的土地。奶奶是1973年去世的,我永远怀念她。奶奶临终前,不止一次对人说——我有一个光荣的儿子禄子,还有一个孝顺的媳妇俊雅,这辈子值!”

言及焦家后人没沾到焦裕禄的光,焦守凤坦陈:“说实话,我们要找领导能找着,但咱家里没这个习惯。这确实有个家教、家风的问题。我妈妈在世的时候,就管我们管得特别严。她说你们要是谁惹了事儿,没人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,都说我是焦裕禄的孩子。大家都这么爱护他的形象,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啊。”

焦家后人以父辈为荣

二女儿焦守云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大伯比较有文化,我的名字是他取的,来自《劝世贤文》的‘守得云开见月明’这么一句,意思是能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看到风雨过后的彩虹,看到希望和胜利。我的经历比较多,焦家出头露面的事儿我做得比较多,我成了焦家的外交官或发言人了。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挺值的。焦家所有的荣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1966年见毛主席,1973年成为‘十大’代表,见了几代领袖,当上了奥运火炬手。我承认我非常幸运。”

1978年,焦守云转业到郑州科技局下属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,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、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团体或单位任职,并被聘为淄博市博山区焦裕禄纪念馆名誉馆长。焦守云说:“2008年退休后,就参与焦裕禄主题的电视剧、音乐剧、纪录片的拍摄、制作工作。我现在很好,家人评我的幸福指数最高。为传承老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,每当做成一件事,我就感到非常快乐。”

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从小受父亲宠爱,原名玲玲。因为想甩掉“娇气”,把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守军”。9岁的一天,兰考县委一位叔叔带她去了郑州的一家医院。父亲病得很重,很瘦,很憔悴,她想,也许父亲休息几天就会回去工作。是父亲提出要见她。父亲看女儿来了,他非常高兴,坚持要坐起来,并且真的使劲坐了起来。焦守军说,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父亲格外喜欢我,一遍遍嘱咐:“要好好学习!照顾好妈妈!”焦守军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。

17岁那年,高中毕业的焦守军到昆明某部当兵。临走的晚上,母亲拉着她的手再一次叮嘱:“到了部队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,不能接受组织的任何照顾,工作上要在前面,待遇上要在后面。”在连队,她当过炊事员、饲养员、报务员;养猪、喂牛、种水稻、进坑道。无论条件多么艰苦,生活多么紧张,焦守军始终严格要求自己,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好评。1987年,到原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,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、多次受到各级嘉奖。

焦跃进在家中排行老五,是焦家后人后来“官”做得最大的一个。当父亲去世的时候,他还只是一个5岁多的孩子,对于父亲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。在焦跃进记忆中,父亲高大而严厉,常常不在家。对父亲的印象,大都来自母亲和周边人的描述。

母亲徐俊雅少言寡语,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千万不能搞特殊,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。那一年,号召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。焦跃进知道,只要母亲向组织提出申请,他完全可以留在县城。母亲拒绝了儿子的要求,声色俱厉地说:别人去下基层,为什么你不能去?“记住了,干好了,你是焦裕禄的儿子,干不好,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。”

在母亲的坚持下,焦跃进来到农村,担任生产队长。也就是在那里,农民讲述的关于爸爸的故事,深深地触动了他,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与兰考人民深厚的感情。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,焦跃进进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——手工脱坯。“脱坯打墙,活见阎王。”焦跃进一天搬2000多块砖坯,晚上经常浑身疼得睡不着。

焦跃进也是像父亲一样一步步干出来的,当过知青,当过教师,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、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、埇阳乡乡长、东坝头乡党委书记,后来任过兰考县委副书记、开封市计委副主任,1999年1月任杞县县长,2002年9月任杞县县委书记。后来,焦跃进成为开封市委常委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开封市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,2014年2月任开封市政协主席。职位高了,地位变了,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刻也没变,踩着父亲的足迹成长。有人劝焦跃进,现在时代变了,经济条件也好了,应该把生活安排舒适些。他说:“父亲在世时,曾因为我们兄弟几个看了一场‘白戏’,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。现在虽说是市场经济了,但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变。”

焦跃进从政期间,曾在乡里、县里、市里的很多部门“当家”,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。在一次会议上,他说:“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己,不搞特殊,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;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,一定要接好父亲的接力棒!”即便现在走下了领导岗位,焦跃进仍常说: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爸爸对我既是一种精神财富,同时也是一种压力。这种压力对我是一种鞭策,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。”

焦保钢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,18岁参加工作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。由于办案骁勇且干练,不法分子闻焦保钢名而胆寒。他多次立功受奖。圈内人提起他的名字,都会自豪地说:“保钢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块好钢。”焦保钢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,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。据焦守云讲,小弟弟相酷似父亲,父亲去世的时候,他还不到4岁,后来有位导演想让他演父亲,因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。

(余玮,焦裕禄研究专家、红色作家、文献研究专家。中国作协会员,出版有《焦桐花开——寻找焦裕禄》等专著。)